

影片之外的戏码,我们不需要

玉渊杂谭

杨雪

五一放假前,朋友圈刷起一帖,说什么“最怕突然听懂了一首歌”,其实是“安利”《后来的我们》。很明显,又是一部贩卖情怀的电影,炒一首经典老歌的IP,继续打坊间大热的“前任”牌。而用脚趾头都能想到,我们这帮老老先衰的怀旧派,即便已经把“栀子花白花瓣”K到要吐,也大多会乘兴前去贡献票房的。

不出意料,《后来的我们》坐稳了五一档首席,但没想到整出个幺蛾子——不少影城出现大量预售票退票现象,而质疑片方此前恶意刷票。不难看出,在线票务平台的发展给票房造假升级提供了空间。如果说之前曾曝出的“公益场”“幽灵场”还算片方用真金白银砸出的票房,那现在利用在线购票规则先冲排片再退票,把承担损失的锅甩给院线,就实在有失厚道,甚至无赖。

不管这“幕后玩家”是谁,原本打算有闲的话也去捧个场,现在是坚决不会去了。个人一向抵触那些写在脑门儿上的商业烂片,这回又多长个心眼:还得谨防

披着文艺情怀外衣的商业片。这里不说“烂”,是因为电影本身或许没那么“烂”,但影片之外的戏码太多,就容易不客观地认识和评价电影本身。再极端如我,干脆懒得瞪浑水。

这些年感觉很明显,越来越找不到想看的国产电影,遑论好看的。我们的确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,全国银幕总数稳居世界第一,这背后是资本的助推。可惜,资本只能砸出规模,不仅无益于电影市场出精品,还妥妥地拉低整体品位。资本只为赚更多的钱,观众可以选择的好电影越来越少……

说回这次退票事件,我们看到,网上票务直接参与影片的拍摄、制作、发行,渗透力越来越大。客观讲,国家电影主管部门执法难度也越来越大,但并非不作为的借口。如何监管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“新兴业态”,恐怕得火速提上议事日程。至于该怎么对付为求迅速获利而无所不用其极的资本,好像还没有立竿见影的好办法。

有网友喊话梁静茹,是时候拍一部《勇气》了。别笑,资本就是这么顽皮,这部《我们都需要勇气》,或者《给我勇气》可能真的会来哦。

大洋科考网事

科林碎玉

刘园园

每天在“向阳红10”科考船吃完早餐,气象预报员于建生的头等大事就是收取气象资料。打开电脑,登录国内服务器,把气象资料拷贝到桌面上。以前用气象传真机气象图需要大半天,如今整个过程不到两分钟。

在这艘船的后甲板,科考设备出现故障时,“向阳红10”船装备助理张元元直接在微信上和国内的工程师商讨解决办法,再也不用打报告使用卫星电话,或跑回房间吭哧吭哧写邮件了。

这都得感谢那个静静地站在“向阳红10”船罗经甲板上的海事卫星通讯系统天线。它为这艘船上的24名船员和40名科考队员提供了两兆带宽的海事卫星网络,使他们在茫茫大洋上长达几十天的漂泊不至于与世隔绝。

船上便捷的网络提高了出海的幸福指数,也让经历过大洋科考多年“涅槃”的老队员感慨万千。

上世纪90年代,参加大洋科考根本没有航道的概念,一上船就要待整个航次——200多天。船上没有电脑,只有一些书和录像带。录像带往往半个月就看完了,之后只能靠下棋、打扑克、聊天打发时间。

在渺无人烟的大海上,想家很容易,跟家人联络却难上加难。船上有海事卫星电话,但一分钟将近10美元,谁也打不起。只能等科考船靠港时,咬咬牙买张电话卡,跟家人倾诉衷肠。当时国内收入少,跨洋通话半小时,半个月工资就没了。在国外码头电话亭排着长队打电话的场景,成为那个年代大洋科考队员心中的共同记忆。

到2002年,“大洋一号”科考船开始进行网络改造。2004年,“大洋一号”正式启用千兆级的局域网,这水平跟当时国际上其他科考船相比都名列前茅。同时启用的还有与外界联系的电子邮件系统。

局域网代替了原来的纸质书、录像带、象棋,很快成为大洋科考队员的精神家园。那里各种电影、电视剧、电子书、海上随笔为科考船上单调的生活增添了许多色彩。更重要的是,大洋科考队员终于要和在海上几乎“失联”的日子说拜拜了。

那时每人上船后都会分到一个邮箱地址。船上的报务员每天早晨8点统一从外界收一次邮件,然后从服务器分发给收件人,晚上8点再把科考队员写的邮件收到服务器,统一



放置在“向阳红10”船罗经甲板上的2M带宽海事卫星通讯系统天线 刘园园摄

一发送出去。发邮件有容量限制,一开始上限是2KB,后来提到10KB,只能写文字。

第一天给家里写封邮件,一般到第二天人才会看到并回复,科考队员收到回复就到第三天了。一旦船上的服务器崩溃,当天收发的邮件都会丢失。尽管如此,由于海事卫星电话比较昂贵,很多科考队员依然把它当做一座孤岛与外界保持联系的唯一通道。

邮件收发系统一直在中国大洋科考的历史里持续了十几年。它在见证其兴衰的科考队员心中,好比一个读者心里有一个哈姆雷特。有人非常喜欢它,在科考船上写了不少邮件。也有人始终不适应,在出海的日子依然感到孤单。无论如何,大洋科考的通讯历史要随着技术大潮也不回地涌向前了。

到2015年底中国大洋40A航次科考时,“向阳红10”科考船有了新的通讯方式——一个叫做“海信通”的聊天软件。出海前,科考队员需要提前在手机里下载海信通,还要一眼可能联系的人打打招呼:我要出海了,麻烦下载个海信通吧。

比起邮件系统,海信通的到来让科考队员跟外界的联系方便了一些。但它的缺点也有口皆碑。这款软件收发文件勉强可以,一上传图片就掉链子,而且极不稳定,有时发出去的信息时隔两三天对方才能收到。

海信通在科考队员的手机里没待多久,科考船的网络就再次升级。

2016年,执行中国大洋40B航次科考任务的“向阳红10”船首次在国内远洋科考船中开通了兆带宽的海事卫星网络。这个网络可以保证科考队员出海时用微信或QQ与外界联系。同时它也保障了船舶安全保障了不少贡献,其中就包括于建生和张元元所做的工作。

至此,大洋科考队员们头一遭在科考船上真正体验到了有网的感觉。

摄手作

归步黄昏

(本栏目图片由手机拍摄)

王兴华摄



西南联大的学人学风

桂下漫笔

胡一峰

每到毕业季,一些大学老师就面临一场“渡劫”。有的老师吐槽,给学生改论文改到心力交瘁,有的论文若非老师从头到尾修改,无法达到答辩水平。在我看来,帮学生定选题、指门径,或对论文个别观点作出批评和纠正,当属导师分内之事。但若到了毕业前夕,老师还在彻夜修改学生的论文,对学生恐怕就失之于宽了。这些年,人们怀念和赞美西南联大。联大各位先生确实树立了做导师的榜样,但似乎很少看到老师“帮”学生把不合格的论文“改”合格的事,更多是老师对学生严格要求、言传身教。新近出版的《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》保留了许多细节史料,不妨摘录几条。

1941年2月14日,郑天挺日记中写到“杨志玖来谈论文事”。杨志玖后来成为著名的史学家,当时是北京文科研究所的学生。抗战时期的昆明虽在后方,但也遭受空袭危险,为疏散考虑,文科研究所移到昆明郊区的

龙泉镇。郑天挺观察到,“自研究生移至龙泉镇,导师不能随时督导,学风渐人情味”。正好杨志玖来了,他就说了这个担忧。“时莘田在坐,斥责甚厉,不愧为严师”。莘田即语言学家罗常培,是杨志玖的指导老师之一。虽然我们不知道罗常培谈话的具体内容,但从郑天挺“不愧为严师”的评语,也可见西南联大的老师对学生是严字当头的。

而“严师”之所以严,主要不是老师个性脾气使然,是为了尊重和捍卫学风的纯正。郑天挺认为,设立研究所,导师和学生同住共食,本意是在学识之外给学生以人格陶冶,有利于造成一种“肃穆勤敬”的学风。一旦学生和导师隔得远了,学风的保持就成了问题。“导师不严课于学生,而学生莫不孳孳不息。此种合家庭、学校、书院为一之学风,不可不保持于永久也。”

严格要求学生的同时,在学术上郑天挺对他指导的学生则是倾囊而授,付出全部心血。1939年2月22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,“清华史学系四年级学生刘文雅,从余作毕业论文,研究湘军编制及训练。下午为之开参考书目,并检曾集有关

系之书札奏稿,过夜半始毕”。为了帮助学生尽快进入论文课题,老师不但为学生开列参考书目,而且彻夜为其检索收集对论文写作有用的史料。

郑天挺是西南联大的教授,也是总务长,行政事务十分繁忙。任继愈说:“总务工作十分繁杂,琐碎,经常有些无原则的纠纷,三校联合,人员的成分也很复杂,郑先生处之以镇定、公平,不动声色地把事情办了。”西南联大《除夕副刊》说郑天挺是“联大最忙的教授之一,一身兼三职,是我们警卫队长。虽然忙碌,却能开晚车做学术研究工作”。

即便如此,郑天挺仍恪尽职守,以诚意对待教师之“分”。1940年1月20日早上七点,要举行“明清史”的考试。郑天挺“惟恐有误,夜眠为之不安,警醒者屡”。刚六点,他就起床了。而工友还来不及生火,他就用暖水瓶里剩下的温水,匆匆洗漱之后赶往学校。到学校后,发现学校的钟快了十分钟,不由心中感叹“幸未致误”。还有一次,他从早上八点开始批了一上午试卷,到中午只完成了一半,下午又有其他工作,只好请别人帮忙批改。为了此事,他在

日记中反省说,自从兼任总务长以来,讲课的精力被分散,而听课人数又增到了150人,“督教尤难,深愧职守之未尽”。别人劝他找一个助教,他一直没有同意,又有人劝他找人代阅卷,他也一直犹豫不决。只是因为学校催成绩太紧,才不得不请人代为批改一半试卷,然而“终觉不安”。

郑天挺这样的老师在西南联大并不孤单。他的日记中还记载了一桩生动而感人的事。1942年6月23日,这一天是“隋唐史”考试。郑天挺把监考等任务交给了何鹏毓。何鹏毓体胖、善烹饪,是个美食家,曾与郑天挺合作开课,对明史有精到研究。这天发生了一点意外,考试时间到了,何鹏毓却未到。“越半时飞奔而来,体既沉重,加以急奔入室,倚墙顿倒。余(即郑天挺)急掖之,幸未仆地,息坐半小时始渐醒,能起立。余劝归息,不肯,盖晨为侍者所误,焦急愧怍,遂尔晕厥,然余则既愧且悔矣。”何老师因监考迟到而至愧疚晕厥,郑老师又因为何老师之晕厥而愧悔,足见“老师”二字在当年的先生们心中的分量。或许,这也是西南联大成为教育史上一个传奇的重要原因吧。

“叛逆者”阿多尼斯:在白昼注视黑夜

文心走笔

唐雪

叙利亚,每平方英里都有一千个悲剧。青枝绿叶的季节,导弹再次射穿了叙利亚的心脏,它猝然倒地。

人人长期处于一种无法克服的痛苦中,内心麻木。唯有诗人阿多尼斯,如慧星划过夜空,大胆叙述那些被压抑、被禁止、被拒绝的无法说出的话,其诗被视为“当代阿拉伯人的文赋”。

城市动荡不安,街头神经错乱,诗句猩红一片:“在名叫乙城的墙壁里,生长着叫做‘杀戮’的永不凋谢的植物。”乙城的墙壁,相互投掷着奇怪的球体,亲眼目睹的人都证实:那些球体就是头颅。”

整体上,外来势力、反对派与政府军,教派、部落与家族,宗教主义、宗派主义与种族主义,纷纷斩断筑城,断谷起障,昏然厮杀,都在阻碍民主、人权和自由。他忿然不已:“我不选择上帝,也不选择魔鬼,两者都是墙,都会将我的双眼蒙上。难道我要用一堵墙去换另一堵墙?”这些话如一瞬间闪电,劈开黑夜。

阿里·艾哈迈德·赛义德·阿巴斯,诗人、学者、思想家。1930年,生于叙利亚穷乡,善作诗;建国初,出乡求学,受困于政治、宗教、社会、党派、文化等权力的高墙中;上世纪50年代,游走政坛,高鸣开放自由之精神;1955年,罹谤遇祸,身陷囹圄,出狱后被迫流亡,获黎巴嫩籍;1980年,移居巴黎,更名阿多尼斯;半世纪后,重履故土。迄今发表诗集22部,文论近20种,把脉文化病根,思想上是中国的鲁迅、语言现代化上是英国的艾略特。

风雨如磐暗故园,诗人见证着祖国与民族不幸的现状,化为荆棘鸟,泣血而歌。他为祖国蒙受的苦难而伤怀:“在这个灾难交织、鲜血铸成的时代,每一天都有一个颤抖的身体在太阳面前醒来,它的名字是——祖国。”

他为民族的落伍而忧愤悲愤:“阿拉伯的大地是忧伤的,她的忧伤是语言额头的皱纹。”“时光,在阿拉伯社会停止了工作,尽管如此,看来只有它还在工作。”

这些诗句犹如酒洒倒在我们的脑子里,唤醒历史的真相,引起棕黑色的剧痛。作为阿拉伯诗歌现代化的先驱,他提出,诗歌是一个“关乎人、存在、人道与文明的问题”。在他的文字中,阿拉伯世界的政权、宗教宛如一个棱柱体,不断折射出这道棱柱上的一块块光谱——自由之死,真理之死,知识之死,人类尊严之死。尖锐的批判、深刻的哲理在时代的深黑背景里沉沉喘息,他对阿拉伯文化的根源与问题发出根本性的质疑,甚至控诉这个时代:“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否认:在G城,二十世纪之后来临的,是公元十世纪。”于是,诗人自身不被祖国所容,只得凄然叹道:“诗人啊,你的祖国,就是你必定被逐而离开的地方。”他开始对自己所属文化作根本性的质疑,成为这个文化的叛逆者和主动的流亡者。祖国不再是出生地和家庭所在地,不会是谋生寄居的地方。他的祖国,是人,是自由,是诗歌,是阿拉伯语。作为叛逆者、浪漫者、战士、美少年的阿多尼斯,他的诗歌有一种创造的意志,摆脱一切压制和强权的意志,保持青春的永恒愿望。

逻辑、理性与诗歌相糅合,祛魅与去媚,爆发出万钧之力。他的诗集译本《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》和中文文选《在意义天际的写作》,皆沉淀着沉重的历史和思考。同时,在灰暗底色下却投射出希望的光芒:“跪曲着,黑暗降生了;挺立着,光明降生了。”“死亡来自背后,即使它看上去来自前方;/前方只属于生命。”这些隐喻和象征仿佛是城市黄昏中一道道粉红的光线,兼具蓝田日暖、良玉生烟的朦胧美,呢喃着近乎悲怆的温柔。

《牛顿的苹果》:关于科学的误解

字里行间

李泳



作者:[美] 罗纳德·纳伯斯 [希] 科斯塔·卡拉波契
译者: 马岩
出版社: 中信出版集团·见识城邦
出版时间: 2017年12月

吉本在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里用略带血腥的墨水描绘了这样一幕:亚历山大女数学家希帕蒂亚被一群蛮人与残忍的狂热分子们“用尖利的蚌壳”将她的肉从骨上刮下,把还在颤抖的断肢投入火中”。发生在公元415年的这一幕似乎标志着宗教迫害科学的开始,而1000年后惨遭火刑的布鲁诺更是“科学的英雄的殉道者”的代表。

两个事件为黑暗的中世纪树立了界碑。但这不是历史,而是“神话”。希帕蒂亚的死是因为政治,布鲁诺的死是因为异端的神学,与他支持日心说无关,其实哥白尼也想着让人“从万物中看出造物主确实是真美善之源”(《天体运行论》导言)。这样的神话在科学史上很多,于是罗纳德·纳伯斯和科斯塔·卡拉波契编了两本书来揭露它们,前编叫《伽利略的圆圈》,续编叫《牛顿的苹果》,副题是“关于科学的神话”——这里的神话(myth),没有特别的含义,与其说是“错误”或“谎言”,不如直呼它“迷失”。

科学和科学史的迷失,大约因为道路岔了:宗教的偏见、历史的误会和方法的错爱。选向不同,故事就走向,且越走越远。我们熟悉的一些“课本常识”,如开头说的中世纪的黑暗,又如哥伦布证明地球

是圆的,哥白尼把人类赶出宇宙中心、伽利略为哥白尼身陷囹圄、达尔文颠覆自然神学……都是后人的误会或歪曲。伏尔泰说认识中世纪就是为了蔑视它,但我们大约是因为不认识它而无视它的存在,当然更不知道中世纪的科学与宗教。

说中世纪是科学的真空,多半是为了更好地说文艺复兴的革命。有趣的是,那“复兴”的古希腊罗马文明,却流落在罗马帝国衰亡后的东方,藏在中世纪的“黑暗”里。走进中世纪,我们会看到它流行的“自由七艺”——语法、修辞、逻辑、几何、算术、音乐和天文学。“七艺”中博学的部分被引向科学,其神圣性则被引向宗教,宗教与科学一直“共生”着,众多学科处于萌芽状态,与宗教的勾连剪不断理还乱。到了19世纪,才有人大张旗鼓地挑起科学与宗教的战争。“论战派”的观点是,基督教的兴起是科学衰落的原因,如古典历史学家Charles Freeman有本书叫《西方思想的关闭:信仰的兴起与理性的衰落》,书名令我想起近些年的物理学派斗争。斯莫林为批判超弦理论写了一本《物理学的困惑》,其纲领性副标题与Freeman是同一思路:“弦理论的崛起与科学的衰落”。物理学家戴维斯也说,物理学的时尚变了,变得像宗

教,“拿信仰做基础”。但信仰不等于宗教,更多时候它只是像爱因斯坦说的“宇宙宗教感情”。很多论战都发生在不同信仰者之间,而不是宗教与科学之间。

从宗教影子里跑出来,会看到更多的神话,如牛顿的苹果、伽利略的比萨斜塔实验,达尔文与华莱士的进化论……它们最终都可归于信仰。更有代表性的例子可能是狭义相对论与迈克尔逊-莫雷实验的神话——那实验与相对论的创立没多大关系,很多课本却爱从它说起引出相对论。课本走的是从实验到理论的传统路线,大多数学科一直走在这条路线上。但爱因斯坦是从麦克斯韦方程的协变性切入的,相对论可以基于两个假定逻辑推演出来,那么任何实验都将是它预言的结果而不是它生成的基础。这就是另一条路线了。一个人选什么路线,不是问题决定的,而是他的“宇宙宗教”信仰决定的。没有这种信仰和感情,科学真的会“迷失”。

作者在乱纷纷功利科学生态里重温一些老掉牙的、谁也不在乎的问题,是因为那些神话的“谬种”流传太广了,总妨害我们认识科学是什么,应该怎么做。借一句老话说,我们的有些麻烦不在于无知,而在于知道了太多不是那么回事的东西。



扫一扫 欢迎关注 嫦娥的秘密 微信公众号